



回忆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

目 录

- 齐燕铭与中华书局..... 李 侃(1)
- 吴晗与中华书局..... 李 侃(15)
- 金灿然和中华书局..... 俞筱尧(24)
- 从《励耘书屋丛刻》说到中华书局
——陈垣生前著作的出版情况 刘乃和(42)
- 郑天挺与中华书局..... 郑克晟(57)
- 以诚待士三十年
——一个政治工作者的回顾 王 春(68)
- 三十年来的古代史编辑室..... 谢 方(79)
- 二十八年为书忙
——述哲学编辑室的工作历程 陈金生(84)
- 北京中华书局图书馆的建立
——南京前国立编译馆图书的北运 隋树森(91)
- 北京中华书局图书馆走上专业性图书馆
的历程..... 魏文敏(94)
- 为书辛苦为书忙
——中华书局编辑部访问散记 贾 敏(101)
- 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的建立与
中华书局..... 阴法鲁(106)
- 雨雨风风二十年
——《二十四史》点校始末记略 赵守俨(113)
- 回忆《中国历史小丛书》..... 王代文(124)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出版的前前后后

.....程毅中 许逸民(131)

二十六年间

——记《大唐西域记校注》的出版

兼怀向达先生.....谢方(136)

三十年的经历.....华昌泗(145)

明本《册府元龟》影印出版追忆.....洪文涛(152)

吴晗和《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戴文葆(160)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编辑经过.....吴杰(169)

新编《孙中山全集》出版的前前后后.....陈锋(175)

《文史》诞生的艰难历程.....沈玉成(181)

追怀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同志.....邓广铭(188)

回忆灿然同志.....李侃(193)

一代史学家与出版家的革命情谊

——记翦伯赞与金灿然的交往.....张传玺(207)

徐调孚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赵景深(216)

作者的知音

——记徐调孚同志.....周振甫(220)

追忆调老.....程毅中 傅璇琮 沈玉成(233)

怀念章锡琛先生.....吴翊如(238)

忆曾次亮师.....赵琪(242)

忆文迪同志.....刘德麟(246)

自称“宋朝人”的王仲闻先生.....沈玉成(253)

英年凋谢忆晓钟.....吴铁声(261)

追忆陈乃乾、陆高谊等在中华影印

工作的事迹.....洪文涛(264)

回忆我同中华书局的关系·····	胡厚宣(272)
祝贺中的回忆	
——庆祝中华书局成立七十五周年·····	刘乃和(275)
我与中华书局·····	孔凡礼(281)

齐燕铭与中华书局

李 侃

(一)

时光流逝，转眼间中华书局又要迎接成立七十五周年了。近三十年中，我在中华书局经历的种种往事，有些早已印象模糊，有些渐渐淡忘。可是有两个人和他们在中华书局所留下的业绩，是我终生不能忘记也不该忘记的，这就是金灿然和齐燕铭同志。关于金灿然，我已经写过两篇怀念性的文字。现在仅就记忆所及，并查阅了一些档案材料，谈谈齐燕铭和中华书局的关系。一则表示怀念之情；二则也想借此留存一些历史资料。

关于齐燕铭的出身经历，我所知极少，这里只好照抄“悼词”：“齐燕铭同志是北京市人，蒙古族，从1935年起，在党的领导下参加革命活动，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鲁西北《抗战日报》主编及政治干部学校教务长，冀南主任公署太行办事处主任，延安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等职。抗战胜利后，随中共代表团去重庆、南京，担任代表团秘书长，以后又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秘书长、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秘书长。解放后，历任中国共产党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候补代表，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国务院专家局局长，文化部部长党组书记，副部长等职。”齐燕铭是一位优秀共产党员，文化战线上卓有成就的领导干部，同时，还是一位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的学

者和专家，他在文学、戏剧、文物、书法、金石和古籍整理等各方面，都有深湛的造诣。

中华书局成为以整理出版古籍和文史哲学术著作作为主要任务的专业出版机构，是与齐燕铭密不可分的。为了说明齐燕铭与中华书局的关系，必须从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成立始末说起。

1957年12月10日，齐燕铭向当时以聂荣臻同志为主任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写了一个报告，提出了建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小组的主要任务是：（1）确定整理出版古籍的方针；（2）领导制订整理出版古籍的长远计划和年度计划并且检查这些计划的执行情况；（3）拟定培养整理古籍人才的方案。小组由十九人组成，他们是：叶圣陶、齐燕铭、何其芳、吴晗、杜国庠、陈垣、陈寅恪、罗常培、范文澜、郑振铎、金兆梓、金灿然、赵万里、徐森玉、张元济、冯友兰、黄松龄、潘梓年、翦伯赞，由齐燕铭负责。小组下设文学、历史、哲学三个分组。在报告中还提出“小组的日常工作，依托以出版古籍为专业方向的中华书局负责”。并“拟在中华书局设立一个编辑部”。同时又提出“为了培养古籍整理人才，拟在北京大学开设一个专业学系”，这也就是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设置的由来。在报告的最后，附了一个各分组召集人和成员名单。这个报告很快得到了科学规划委员会的批准。现将各分组成员名单列下：

（一）文学组：召集人郑振铎、何其芳。成员有：王任叔、王伯祥、王瑶、余冠英、邢贲亨、吴晓铃、林庚、阿英、孙楷第、徐嘉瑞、徐调孚、章行严、陈翔鹤、冯至、冯沅君、游国恩、杨晦、叶圣陶、隋树森、赵万里、钱钟书、魏建功、罗常培、谭丕模。

（二）历史组：召集人翦伯赞。成员有：于省吾、尹达、白寿彝、吴晗、吴泽、汪篔、周予同、周云青、周谷城、邵循正、金兆梓、金毓黻、范文澜、徐中舒、徐炳昶、徐森玉、翁独健、夏鼐、宿白、张政烺、陈垣、曾次亮、贺昌群、傅乐焕、齐思和、邓广铭、邓拓、顾颉刚、陶文儒、聂崇岐。

(三) 哲学组：召集人潘梓年、冯友兰。成员有：王维庭、石峻、朱谦之、李达、李俨、吴则虞、吴泽炎、杜国庠、汪奠基、林宰平、林涧青、侯外庐、胡曲园、孙人和、唐钺、容肇祖、陈乃乾、嵇文甫、杨荣国、赵纪彬、刘盼遂、谢无量。

从上面这个小组名单和各分组名单可以看出，规划小组包括了当时文史哲各方面有成就的专家学者。如今时隔近三十年，其中很多人已先后逝世，也有不少人是在“文革”中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而死。而健在的专家学者也多是七、八十岁的学界前辈了。

在科学规划委员会批准了齐燕铭的报告和小组名单之后，他又在1958年1月21日给中央宣传部和周扬同志写了一个报告，比较全面地说明了中国古籍的情况和整理出版工作的现状。提出“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是远远落在客观需要的后面了”。提出需要“加强领导，全面规划”，合理地组织人力，提高整理和出版质量，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导下，使这一工作适应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建设事业日益发展的需要。报告还根据不同类别的古籍和不同的读者对象，对整理方法和步骤提出了具体方案，并建议中宣部对此进行一次讨论。

同年2月9日到11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会议。齐燕铭在会上就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情况和今后的方针、计划要点作了报告。康生、周扬也在会上讲了话。（当时的康生对整理出版古籍表现了热心赞成，大力支持的态度。而且以“内行”的架势发表意见。然而“文革”期间，他却翻云覆雨，对古籍整理工作极尽诬陷迫害之能事。）同年4月，文化部重新安排了中华书局的任务，规定中华书局“除以出版古籍为主要任务外，还适当出版现代作者的文学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并在上海设立一个编辑所”。这时，金灿然同志已调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中华书局同时也是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办事机构，金灿然兼任办公室主任。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成立，是新中国文化事业史上的一个重大措施，齐燕铭同志在这个事业中作出了重要的建树，而对中华书局业务的开展和历史命运，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

我于1958年7月调到中华书局工作，当时对于古籍整理不但知识极少，简直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对金灿然同志过去虽然认识，但并不熟悉。对齐燕铭同志虽然久闻其名，也只是在他担任国务院专家局局长期间，因我那时在中央宣传部的知识分子工作办公室工作，参加过两次他主持召集的高级知识分子问题座谈会。从他的言谈举止中，感到他是一位文雅庄重、气宇轩昂的人物，私下里曾与同去的同志议论：齐燕铭确有与周总理颇为相似的风范。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以后，工作进展很快。在1958年4月到6月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文学、历史、哲学三个分组都各自制订了一个计划草案，开列的书目洋洋大观，包括“经、史、子、集”各种古籍不下万余种。当时正是“大跃进”的“高潮”，现在回想起来，“大跃进”固然是“左”的指导思想下的产物，对社会主义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带来了严重后果，但当时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热情、干劲确实很高。齐燕铭在百忙之中，不时也到中华书局来，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从此与他接触逐渐多起来。当时他和金灿然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在各分组制订的规划草案基础上，制订一个综合性的长远规划。据我的记忆，除了各种专项计划之外，一共搞了三次长远规划。其中有一次只是提出一个草稿，几经讨论，并未形成正式规划，以后（大约是在1959年左右），就以这个草稿为基础，搞了一个《整理和出版古籍的十年（1962—1972）规划》，这个“规划”的开头就说，自从1958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之后，“制订两次长远规划（草案），这样就使整理和出版古籍的工作有了计划性。但是，由于这项工作开始不久，经验不足，加之，在这一时期内，有关学术机构的教学和研究任务繁重，古籍整理出版

机构的人力不够充实,因此,规划草案中所开重点项目,绝大部分未能实现”。十年规划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实际情况下列订的。然而古籍整理工作得不到顺利开展,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这就是从1958年的“大跃进”到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不断、“批判”不停,在此期间(1958年春)陈伯达又在科学规划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厚今薄古”的口号,这对整理出版古籍部门和经营古书行业的工作人员是一个很大的思想冲击。中华书局有些编辑人员感到自己的工作是属于被“薄”之列,因而思想波动;中国书店有些发行工作人员,因为营业萧条,门庭冷落(买古书的人减少,卖古书的人增加)而惴惴不安。这些情况,都反映到齐燕铭那里,并且希望他能对古籍出版、发行单位的干部、职工讲讲话。他先后就古籍发行和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应如何对待“厚今薄古”讲了两次话,一次是1958年7月12日,在中国书店举办的古籍发行人员训练班;一次是在中华书局。齐燕铭在当时当然不可能直接批评“厚今薄古”这个口号,不过还是婉转地表示了他的看法。

他首先回答了古书和整理古籍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古书发行和古籍整理工作有没有前途的问题。指出“厚今薄古”,“并不等于把古代的东西抛弃不要。因为中国有四千年的历史,如《诗经》中就有三千年前的作品……,如果认为古书的存在妨碍社会主义建设就应消灭它,这就不是厚与薄的问题,而是存与废的问题了”。他认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古代历史文献和古典文学作品与社会主义建设不应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吸收古代文化,会使社会主义文化更丰富多彩起来。进而指出“不但中国的古籍要研究,外国的古籍如柏拉图、莎士比亚、达尔文、托尔斯泰的名著,我们都要研究”,都要拿过来利用。对于古书业传统的技术要保存,要有人学习,把它继承流传下去。他着重说明,古籍整理和古籍发行工作,肯定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肯定有前途,要大家不要消极,不要灰心,关键在于认真钻研业务,为人民服务。两次讲话的内容基本相同,只是针对两个单位的不同特点,内容也各有侧重。他

在讲话时，不是以领导者的口吻教训人，而是用平常谈话的方式，把问题讲得入情人理，平易近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现在，回过头来再说制订规划的问题。十年规划(草案)虽然已经把古籍项目压缩很多，但仍然不可能实现。于是在1960年，齐燕铭又提出要根据当时党对各项文教事业“全面安排，保证重点，提高质量，突破尖端”的方针，制订一个《三年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的重点规划》。

从1958年开始，除了第一次文、史、哲各分组制订的规划我未曾参与之外，其余几次规划的讨论、起草、修改工作，我都有幸参与其事，对齐燕铭同志的接触、认识也多是通过对制订规划逐步加多的。在前两次制订规划过程中，齐燕铭虽然也亲自过问，但一般主要是从方针政策和基本做法上给予指导，其间也召集过几次座谈和讨论，这些座谈和讨论多是利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开会的机会，邀集部分小组成员和有关学术界人士征求意见。而这次制订“重点规划”，他就不但在方针政策和方法上做具体指导，而且对每一类古籍的整理，从读者对象、整理方式、乃至许多具体项目，他都要亲自过问、反复斟酌，决定取舍、加以增删。在这个“重点规划”的“纲要”中，把古籍的读者对象分为“干部和学生读物”、“科学研究工作者和教学工作者的参考书”两大类。前者包括“古籍读本”、“古籍普及读物”、“古籍今译本和改写本”以及《中国历史丛书》(中级读物)、《中国历史小丛书》(普及读物)和《新编历史演义》；后者包括“历代名著”(文史哲)、“专题史料汇编”和“工具书”。全部规划共包括各类古籍五百多种。规划定稿以后，报送中央宣传部批准，并由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别于1960年10月、11月向全国有关高等院校和有关科研单位发出“协助整理古籍的通知”。由于这个“重点规划”比较切合实际，重点突出，要求明确，加上领导的重视和有关单位的协助，又采取了一些有力的具体措施(如借调一批著名学者专家集中到中华书局整理“二十四史”)，因此，规划中的绝大部分项目都得到了落实，不少经过整理

的古籍和学术著作陆续出版。“文革”造成的十年内乱，虽然使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完全中断，但是在1979年中华书局又重新恢复建制和原定的任务之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和中华书局的业务又得以比较顺利的开展，这是与齐燕铭、金灿然在制订规划和具体措施方面打下的基础分不开的。至今中华书局出版的古籍中，还有不少就是当年落实和已经交稿、发稿的项目。

(三)

齐燕铭与中华书局的关系，并不限于在制订规划、执行规划方面的指导和支持，而且在日常许多重要业务问题和充实编辑力量、改善工作条件等各方面，都给了有力的指导和帮助。金灿然和齐燕铭在工作上和组织上是被领导与领导、下级和上级的关系，但他们之间的友谊是从延安时代就建立起来的。这种同志间的亲密友谊，不但表现在工作中的互相信任、互相支持上，也表现在彼此在政治和生活上的互相关心、互相体贴上。

金灿然在“反右派”斗争期间，由于处理他的中学同学（已被划为“右派”）的译稿问题，曾以帮助“右派”为由受过批评，并被视为思想“右倾”。他是背着思想包袱到中华书局就任的。在当时那种“左”的政治氛围中，只要被认为与“右”字沾了边，就会动辄得咎，随时都会被“抓住辫子”挨整的。因此，他在工作中十分谨慎。齐燕铭主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期间，对于许多工作上的问题，他都要向齐请示，而齐燕铭也几乎是有问必答，有求必应。现在翻阅当时的有关档案材料（已残缺不全），还会看到许多这方面的情况。现举以下几件事例为证。

第一件，关于《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从1959年开始，中华书局办了两个油印的“内部刊物”：《古籍整理出版动态》和《组稿、作者情况简报》。到1960年共出了三十七期，内容主要是报道整理出版古籍的有关方针政策和计划，交流工作和学术活动情况。鉴于这两个小刊物颇受有关同志的重视，金灿然向齐燕铭提议把

两个刊物合并,改为铅印。齐为此特地向中宣部和周扬同志报告:建议批准改为铅印,“定名为《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每月一期,每期一万二千字,发行六千份”。并提出“重要稿件由齐燕铭负责审查”。报告很快得到批准,齐燕铭为“简报”亲自题写了刊名。这个“简报”一直延续到现在。从第90期开始,改由现在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印。在古籍整理出版单位和有关学术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受到了广泛的注意和好评。

第二件,是关于对几部书稿如何处理问题的具体答复。

1959年,将要出版的《永宪录》是《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史料价值较高的一种。书中有一条关于清廷捕杀朱一贵的记载,其中有台湾“归明后,地为红彝所据”,“顺治十八年围台,败荷兰”,“康熙癸亥入我版图”等语。因为事涉台湾归属时代问题,金灿然拿不定主意,向齐请示处理办法。齐回信说:“台湾沿革,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五《台湾事辑》言之最详。大约其地本荒岛,除土人外,陆续去者均为中国贫民,即《明史》所谓往往聚而为盗者也。黄宗羲《行朝录》称,招饥民开垦始于郑芝龙,其后又为荷兰人侵据。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又称,红夷于天启二年请求互市,总兵俞咨皋移之北港(即鸡笼山),则荷兰之居澎湖似曾邀得中国同意者。由此言之,其地属于我国可知。已往姑不具论,清代已将台湾列入版图。凡各种记载所言先后不同,排比而观,本无抵牾”,“《明史》称何楷陈靖海之策,此策《明史》楷传不载,可觅《明文在》一检”。据此,他批示:“原文付印,不必改字,无碍于事。”

此信对台湾归属问题,征引各种历史文献,有理有据,简直是一篇精炼扼要的审稿意见。于此也可见齐燕铭学识之渊博,态度之认真和思想之敏锐,意见之明确。

1959年,有人提议重印王国维遗书,金灿然又向齐请示,其时齐正在广州从化温泉休养,立即回信说:“王国维遗书重印,想了几点意见,写出请你考虑:一,目前应择要标点印行,非切要者,自可到图书馆借阅,无须立即重印,因此选择宜严(具体意见,目前只

印《观堂集林》和《蒙古史料》两部分即可)。二,将来标点本总宜‘全’,总不应使《王忠愍公遗书》专美于前,而新中国对于这样一个学者倒无全集出版。三,由于以上两点,所以我主张分辑出版,留待以后出全。四,因此原编各种,除别人所作的序、传等,均以不删为是。如别集中致北大某教授书,足见王氏政治态度,尤不宜删,象这种文章实在说不上什么毒素。”“以上意见也许类似保守,但从长远看来,可能正确。”齐燕铭此信所论,其意义远不限于对王国维遗书,而是对整个古籍整理提出了原则性的重要意见。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这些意见的正确。现在《王国维全集》已经着手编辑并将陆续出版。人们重读此信,不能不赞佩齐燕铭的高明远见。

此外,如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出版《辛亥革命回忆录》及请宋庆龄副主席撰写序言问题;《文史》杂志的创刊和编辑方针问题;《古本戏曲丛刊》的继续编辑出版问题;《全清词钞》的出版、《大唐西域记》的整理,《章太炎政论集》以及档案史料的出版等等问题,齐燕铭都提出过具体意见,并给了有力帮助。在他主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期间,可以说中华书局没有哪一件重要的工作和哪一种重要的项目没有倾注他的精力和心血。

第三件,是关于中华书局的办公用房和宿舍及充实编辑力量问题。中华书局于1954年公私合营,先是与财经出版社合并,1957年又从财经出版社分出来并入古籍出版社。几经变迁,几经周折,到了1958年确定以出版古籍和文学、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作为主要任务时,书局中真正胜任整理古籍的专门人才已经寥寥无几了。金灿然到任之初,中华书局不论在人力、物力等各方面的基础都非常薄弱,就是在当时全部只有128人的情况下,办公室和宿舍也十分拥挤。办公室和图书馆都集中在东总布胡同十号大院东北角的一个小四合院里,不但毫无发展余地,连现有人员也难以容纳。1961年3月31日,金灿然在与文化部几经交涉,不得要领的情况下,又向齐燕铭写信求援,信中说:“中华的房子,实在挤不下了,办

公室、宿舍都挤到很影响工作的地步。一、二十个人坐在两间通起来的大办公室里，说话、走路、电话的声音整天不断。宋云彬夫妇二人，一个保姆，只有一间房；杨伯峻一家六口（三子女、一保姆），住在通起来的两小间内，影响睡眠，由睡眠影响血压，现在已请假休息；马宗霍自己租了一间半房，书籍放在走廊下，房间白天还要开灯。很希望解决一下。”齐燕铭4月4日批复：“请中华再将房子情况写报告给我，准备向房管局交涉解决。”接着中华书局又写了一个有关房子困难的具体材料，并且提出了有几处空闲楼房可以考虑搬入。经过种种努力，终于在1961年秋季，搬到了西郊翠微路二号（原文化学院的旧址），办公室、图书馆、职工宿舍得到相当圆满的解决。

充实编辑力量，物色和培养古籍整理编辑人才，这是金灿然任职期间始终抓得很紧的一件大事。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他却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他明明知道有些人是擅长整理古籍，而又被放置不用的，但这些人中间有些是划为“右派分子”的。他当时的政治处境并不顺利，甚至有些应该阅读的文件，都不叫他看；有些应该参加的会议也不叫他参加，在调人问题上，他有难言的苦衷。但工作又迫切需要，他曾向齐燕铭推荐过一些专家，其中包括朱偁、宋云彬、杨伯峻、巩绍英等同志。宋、杨经齐燕铭协助，总算调来了，但在调宋云彬的问题上，他还是挨了当时文化部某位领导人的批评。六十年代开始，齐燕铭担任了文化部的党组书记之后，马宗霍、孙人和、李庚序等才得以比较顺利地调来书局。而金灿然在用人的问题上，敢于提出“人弃我取，乘时进用”的意见，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中华书局搬进新址，业务日益开展，人力不断充实，确实出现了兴旺发达的景象。就在搬到翠微路的第二年（1962），恰好是中华书局成立五十周年。金灿然经过与齐燕铭商量，并得到有关领导机关的批准，决定举行一次纪念中华书局成立五十周年纪念会。开会之前，郭沫若、齐燕铭专门题诗祝贺。郭老的题诗是：“五十年

间天地改，中华文运更辉煌。梯航学海通今古，鼓扇雄风迈宋唐。”齐燕铭的题诗是：“五十年来负盛名，当时共许契刊精。人民作主开新纪，文采风流迈旧型。校理古籍千载业，切磋疑义百家鸣。社会主义光芒大，夕秀朝华启后生。”

1962年1月4日举行的纪念会开得很隆重。胡愈之、陈叔通、叶圣陶、翦伯赞、吴晗等均到会祝贺。齐燕铭在中华书局成立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既肯定了中华书局几年来的成绩，也指出了不足之处。他“希望中华书局不仅是一个出版社，还要把整理古籍的力量团结起来”，“要把目光放远一些，团结全国对古籍有素养的人们，形成一个全国整理古籍的中心”。“有了这个中心，一方面整理一些专著，供学者研究；一方面使古代文化通俗化，让广大人民作为营养去采择、吸收”，“把古代文化的力量加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去是一个严重的任务，应该由许多机关、许多人来承担。而中华书局的干部，则承担了很重要的一部分”。他对中华书局寄予了殷切的厚望，认为书局“新的使命刚刚开始”。他的讲话给了书局的全体职工以很大的鼓舞。

从1960年到1962年，可以说是中华书局发展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它在学术界的声誉日益提高、影响日益扩大，与学术界的联系日益密切。而所有这些都是同齐燕铭的关怀、指导和具体帮助密不可分的。

(四)

齐燕铭在中华书局的历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也给我们留下了痛苦的历史反思。

正当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战胜了三年困难，国民经济日趋好转，中华书局也正在正常的轨道上以欣欣向荣的姿态继续前进的时候，政治气候又开始发生了变化。从1962年下半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提出，和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及196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叫“四清”运动），

都给中华书局(何止中华书局)工作造成了困难,也在人们思想上罩上了阴影。齐燕铭的处境日益困难了。到了1964年,文化部开始“整风”。我当时在山西昔阳县搞“四清”,详情不得而知,后来才知道,文化部被指斥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死人洋人部”,这样一大堆大帽子,其问题“严重”可知。身为文化部党组书记的齐燕铭当然首当其冲,其来势之猛,批判之烈,也自不待言。“整风”的结果是文化部领导改组,齐燕铭在“检讨”之后,还算“从轻发落”,被下放到济南市当了一名副市长。

齐燕铭的撤职和政治风月的变化,不但使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工作陷入停顿,中华书局也失掉了最热心最有力的指导者和支持者。而且“整风”还要向各基层单位铺开。本来就心有余悸的金灿然,此时此刻的心情沉重、苦闷懊丧,可想而知。他的脑瘤经过手术之后,虽可以勉强恢复工作了,但他又怎么工作呢?不知什么时候就要挨“整”,工作越发小心谨慎,原来的规划、设想都无法实现了,只是勉强维持出点书而已。但是古籍中“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太多了,而这个工作又是天天与“死人”打交道的事情,要“批判”那是随时随地可以搞起来的。于是只好用“内部发行”的办法,连《全宋词》、《筹办夷务始末》、《戊戌以后三十年政治史》、《义和团资料简编》这样的书都“内部发行”了,而且还要加上贴标签式的前言后记,表示出版者的“立场”和态度,以此来避免被“抓辫子”。有些书排版了,只好打成纸型放起来,而不出版。一种乌云笼罩、山雨欲来的气氛,凡是稍有政治敏感的人们,都预感到了。但是善良的人们谁也不曾料到,这一次掀起的狂风恶浪,竟是祸国殃民,叫做“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

中华书局和金灿然的灾难果然提前来临了。1965年11月末,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了,在诬陷吴晗的同时,指名“批判”了中华书局出版的《海瑞的故事》(此书由我组稿发稿,第二版经金灿然修改),这自然就把吴晗同金灿然联系上了。在那种沉重的压力之下,除了“检讨”和等待挨批,再无别的办法。

金灿然就在思想极度紧张、心情万分忧郁之中，脑病复发了。到了1966年，“五·一六通知”发出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失去理性，疯狂邪恶的十年开始了。6月16日，文化部在社会主义学院举办“干部集训班”，把文化部从原来的副部长到各单位的领导干部和所谓“业务骨干”都集中到“集训班”去了，名曰“集训”，实际上是集中审查，反省、批判。“集训班”是由军队派出的工作团和“整风”后文化部的新领导人主办的。这时江青已经给原来的文化部和整个文艺工作定了“大罪”，说是十七年文艺工作被“一条黑线专了政”。进入“集训班”的人，也就是“专”了江青“政”的“黑线人物”。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地被送进了“集训班”。

“集训班”里空气紧张，人们心情沉重。每天晚饭后大家都绕着大楼绕圈子，很多人愁眉苦脸，低头不语。不知等待自己的是怎样的命运。

有一天忽然传来消息，说齐燕铭也被“勒令”从济南回来参加“集训班”了。果然，就在消息传来之后的一天晚饭后，在照例漫步绕圈子的时候，我见齐燕铭一人迎面走来，他面色苍白，但依然衣冠齐整，身躯挺直。我上前与他握手，他微笑点头，低声问我：“金灿然同志身体怎么样了？”表示十分关切。我只简单告诉他第二次手术以后，情况不大好，现在在家里养病。说了几句话，就各自走开了。以往我虽然也经常和齐燕铭见面，但从未直接交谈过什么，因为当时我与他是领导被领导的关系，而且都是与金灿然一起在会议上研究规划和工作问题，即使先后两次与金灿然到他在砖塔胡同住宅去请示工作，也没有直接谈话。这一次情况却不同了，因为不论级别高低、年龄大小，都属“黑线人物”，“在黑线面前”“平等”了。

随着“文革”狂涛的加剧翻滚，到7月下旬，天天有些单位的“造反派”到“集训班”来“揪人”。有些单位开来的卡车上贴满了五颜六色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黑帮分子”之类的标语，并且糊成一些奇形怪状的“高帽子”，象押解犯人一样，把所谓“黑帮”戴上高帽子，押上“囚车”，呼号而去。“集训班”办不下去了，我们中华